# 第一部

# 舞者和舞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第一章　一个激进主义者的安魂曲

“人们不知道应把它当作一个怀旧和再奉献的时刻，还是把它当作一支安魂曲，给予他们生命中的那个幻想时刻，那一时刻结束时是美好的。”一位朋友在费伊·斯坦德的葬礼上说。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罗斯·波德来了，激进派律师、费伊以前的导师查尔斯·凯瑞也来了。他们穿过人群，面带悲哀地互相握手。西海岸地区的左派法律社团献了挽联。在这三百多名哀悼者中，大多数人是匿名者，包括各种各样的人，社会活动者及其支持者、朋友和旅伴，他们是费伊在其短暂的生命中结识的人。

如果说葬礼的气氛是复杂的，那么这很可能是因为她的死太突然，悼念活动实际上有点反思的味道。费伊的大部分亲友早在她痛苦的最后一年就开始哀悼她了。在西奈纪念教堂中几乎没有泪水，灵柩被剑兰花遮得严严实实：死亡被放在了遥远的地方。主持者没有号召人们为死者哭泣，也没有挥动血衣。假如她死在几年前，在一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一定会那样做的。他们仅仅试图回忆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为一个妻子、母亲、工友，当然也作为一个被压迫者的卫士和绝望者的辩护律师。

尽管颂词是低调的，但是出席葬礼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激进

派热情高涨的时刻——费伊作为“黑豹党”成员休伊·牛顿和乔治·杰克逊的辩护律师，暴风骤雨般冲击了政治藩篱，州监狱当局公开称她为“加利福尼亚州最危险的女人”，私下里称她为“龙女”。实际上，出席葬礼的每个人都能记起费伊的一个故事，如缠着她颇有名气的律师朋友，直到他们同意为一个或两个黑人犯人写状子，这些黑人曾每个月给她写几百封信；驱车狂奔使自己疲惫不堪，以摆脱她的情人乔治·杰克逊。尽管她没有其他那些在法庭上大打出手的人出名，但是她却是那场运动的典型，更接近于激进运动的标准——无情地推动人类极限；被不公正赶进牢笼；在革命责任中寻求自身的真实性；在其职业高峰期，最后混淆了被代理人和同志、工作和生活的界线。

如果说这些辉煌的事情在费伊的葬礼上无人提及，那么费伊最后一年的个人生活更是无人触及，当时她从以前的承诺中后撤，试图探索家庭和女权主义的新模式。这样的新生被突然而至的暴力打断了，一个出狱人员声称代表被误解了的乔治·杰克逊向她开了五枪。然后是数个月的瘫痪和痛苦，接着是孤独的自杀，让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多么希望她能像为别人斗争一样，为自己斗争。

也许，费伊的生死太复杂。或许，由于命运的反复无常，她的悲剧几乎不被人理解。60年代后的十年是保守主义盛行的十年，一些人原有的信念受到冲击，对于这些人来说，她的悲剧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信息。然而，这个遗漏让葬礼有种不完整的感觉，似乎这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故事，一个有意义的教训故意被遗忘了。

葬礼结束后，人们来到室外，站在阳光灿烂的小路上。谈论的主题多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而不是费伊。在激进运动风光不再

的这些年头里，他们去何处旅行了；在继续坚守信仰的同时，他们做出何种让步与妥协了。在墓地里，有一个简短的仪式，出席者应邀去给灵柩上撒一把土，向死者做最后的告别。“在这一时刻，”费伊生前的一位密友说，“你几乎能听见她低沉的声音，那是昔日的费伊，我们想记在心里的费伊。‘等一等，’她似乎在说，‘等一下，该死！’这里面应该有更多的含义。”

像60年代突然转化为激进派的其他人一样，费伊有一种适合媒体报道的性格，冷静且不易屈服。她的脸挤成一个恒久不变的中心，这是她性格的反映，既冷静又爱好嘲讽，完全是一台受逻辑驱动的机器。与她相识的人对其印象各不相同。

她是一个与自己不断争吵的女人，遭受着矛盾情感的折磨。她担心自己的模样，担心对服装如此感兴趣是否正确。她认为自己长相平平，但又担心美容可能属于伪善。事实上，她的脸远比她自己想像的有吸引力。她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担心自己给人的印象有点胖，这是正确的。她对囚犯作为“被锁住的高等人”的认同，来源于或至少部分来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即她自己被局限在这样一个身体里，不能完全表达自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她感到自己弱小无能时，她的好友，特别是女友却认为她是她们见过的最强有力的人。在她的一生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在实践一种成功地自我表现的战略，把才华体现在身体上，让自己迷人的风度能够吸引过路人，当然是那些她认为正直的人。

费伊独断专行、自我膨胀，为了自己的事情而冷酷无情。她常让别人感到忍无可忍而发怒，但看到这种结果，她自己还感到很惊奇，很受伤害。然而，她又能非常大度，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属于她的东西，她却能不为所动。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费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年的一位密友向她透露，自己有过一段无力了断，但对自身极具破坏性的爱情。而费伊认为任何人都有能力拒绝他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她称这位密友为“失败者”，不敢去追求美好的东西。费伊对别人的事情如此不敏感，有时几乎接近于无情无义，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但费伊却认为人们都对自己不好，这种思维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担忧，以至于她在办公室同陌生人常发生冲突。一个停车场管理员的指责能对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费伊身上的激进主义是那样的自然，以致人们可能认为她生来就穿着红色尿布，或至少是一个纽约人，把左派政治活动当作一种常规训练。事实上，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普通中产阶级，是犹太人，三代世居加利福尼亚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但从不张扬。因为家庭地位及其犹太文化的原因，她只通过间接方式表达不满，进行反抗，最后通过政治途径表达自己。

费伊的父亲，山姆·亚伯拉罕是一个沉默的人，对人生的机遇和灾难有固执的理解，他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男孩显然极为失望。费伊总是认为她的小妹妹丽赛更靓丽，更成功，因而取得非凡的成就似乎成了她惟一的出路。她的母亲也想迫使她更成功，这在后来增强了费伊的反叛性。费伊 3 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让她学钢琴，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为了防止费伊晚上睡觉时吃手指头——这会毁掉她的音乐职业，于是在她睡觉时，母亲用绳子捆住其双手。费伊要按母亲的要求穿难以忍受的矫形袜子，并不是她的脚有问题，只是母亲想让她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一双漂亮的脚。费伊还要戴上令人厌恶的牙齿矫正器，是因为母亲想让她日后能有一个迷人的笑脸。甚至当费伊受枪击后，在医院接受重伤治疗时，她仍抱怨母亲对其前额的抚摸太粗暴，不是要安慰她，而是要驯服她的头发

费伊 9 岁时，她家从旧金山搬到了伯克利。她成了一名伯克利人，这个称谓主要来源于思想观点，而不是地理范围。伯克利大学的政治、文化自由主义从学校向校外社区扩散，她被深深地感染了，这种情感最终导致她新左派思想的产生。朋友们记得，她抱怨自己“被钢琴奴役”，尽管她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同旧金山的名人同台演出，在 14 岁时就可以演奏《国王》了。她孤独、烦躁、轻浮、没耐心，急于越过模糊不清的青少年时期，直抵成年人的权利和责任。为了同其他熟人竞争伯克利高中女生联谊会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并可能是反犹太主义的，费伊同教友派的人一起在郊区度过了一个周末。那个社区里道路破败不堪，碎纸片随处飞扬，是黑人贫民的居住区，是一个能让人真正看到灵魂的地方。

她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孩，但似乎又比青少年偶尔的无政府主义多了点什么。有时，她会把《时代》杂志压在音乐书下，阅读有关国际政治的封面文章。有时，她会在周末同女友一道搭公共汽车去旧金山，花一整天时间参观金门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斯坦哈特海洋馆。她跑进走廊里，打开每一扇标有“私人拥有”的房门。在她停止学习钢琴之前，她已经违背父母的意愿，去当地卫公理教堂为星期天祷告演奏，虽然她在演奏基督教圣歌的当中，夹杂了几首酒吧里的流行曲。

她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和感情，这是直觉式的感知，而不是逻辑推理。文蒂·麦尔默，费伊最要好的高中同学之一，记得当时很忌妒她。她坐在长凳上等公共汽车时，拿出四五页纸，字体漂亮，上面写着她内心深处的感想。当费伊进入俄勒冈的里德大学时，她决定学习文学，这是一所自由主义的艺术学府，以反对权威、崇尚改革而闻名。但是，在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她

去墨西哥参加一个卫公理会的活动，帮助那里的农民抵抗伤寒病，这次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目标。大学四年级时，她转学到了伯克利，学习法学预科，与杨·李·凯利同住一屋，她是后来伯克利城市协会中激进派的重要一员。杨那时叫贝蒂·李，是一对中国农民移民夫妇的女儿。费伊发现这个人很有趣，她们俩进行了长谈，不仅谈论种族主义，还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费伊当时已经开始关注大的问题。”杨回忆。

后来，费伊去芝加哥大学学法律，师从默尔考·夏普，他曾写过一本关于罗森伯格斯的书。他邀请费伊帮助他处理一个诉讼案件，被代理人是莫顿·索贝尔，是一个著名的核间谍案中的第三方。当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来看她，要求外出观光时，她带他们去贫民区散步。她对当时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感兴趣，这些活动带有浓厚的麦卡锡主义气息。在同全国律师工会（总检察长不久前称此为“共产党阵线”）的学生分会成员见面后，费伊径直找到该团体的主席马文·斯坦德，讨论她去墨西哥参加卫公理会活动的经历。经过三个月的恋爱后，他们结婚了，这桩婚姻被称为是为了受压迫者利益的合资企业。

60 年代，费伊重返伯克利，她和马文发现那里的政治气候比较适合他们的理念生存。这时，费伊 28 岁，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是男孩，叫尼尔，一个是女孩，叫奥格兰。费伊充满活力，喜欢变化，对一切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东西都感兴趣。除了业余时间为查理士·凯瑞领导的一家左派律师事务所工作外，她、马文与其他三位律师一起创立了“正义协会”。作为后来“法律集体”的先行者，该协会是“一切正义事情的保护伞”，工作包括帮助当时尚不知名的图莱县负责人，替西海岸受农场主歧视的黑人打官司。费伊参加了一切工作，从法律援助到“军事

母亲”活动。

贝蒂·安·布鲁诺当时是一家电视台的记者，那时认识了费伊。布鲁诺在照看孩子的问题上有了麻烦，通过传统的渠道求救无效后，受“别去碰瓶子，去拿电话”这句口号的感染，她打通了这个称为“匿名母亲”组织的电话，费伊在电话的另一端。“那是她家里的电话，她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可能也是惟一的工作人员，她问了我的困难是什么，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只要是我需要，她就同我交谈，我想谈多长时间就谈多长时间，看起来她把自己完全贡献出来了。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置信，我只不过是一个有了麻烦的陌生女人，而她却愿帮我。”后来，她们两人成了朋友。当时的法律禁止父亲进入加利福尼亚的产房，费伊出来反对这个法律。布鲁诺的丈夫也是律师，他加入了费伊的行列，最终他们促使这条法律得以修改。

费伊似乎可以立即出现在任何地方。但是，在她的性格中存在着缺陷，那就是烦躁，或者是一种没有章法的摸索，这表明她不会满足于普通生活。那段时期的一位朋友说：“她的雄心大得出奇，马文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马文和她参加完一个政治活动，我们三人在她家的公寓里，她对晚上见到的人及这种关系将给她带来什么充满了激情。马文和我对她精于算计的野心十分反感，我们不止一次地为发生在她身上的这种事面面相觑。”

安·金哲，费伊一生的职业朋友，梅凯·约翰研究所的负责人，说：“她一直在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其意义大于她所能挣的钱，大于她所能建立的法律原则。她想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因而当她的被代理人不具备她所要求的这种意义时，她便赋予他们这种意义。”作家格雷戈里·阿姆斯顿，后来曾与费伊共同在乔

治·杰克逊辩护委员会工作，同意这种看法：“像当年的其他左派人士一样，她非常饥渴，总在寻找一个伟大的梦想，并准备为之贡献一切。”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既为她实践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舞台，也帮助她找到了公众支持。以“正义协会”为政治基础，她渐渐成为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西海岸朋友”运动的灵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学生非暴力合作委员会”的简称，是一个对小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改革主义失去了耐心的激进民权运动组织）。费伊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捐款和义演。在逾越节，像在此次运动中的其他犹太人一样，她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们组织静坐，这个活动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同犹太人出埃及联系在一起。在 1964 年和 1965 年，费伊去南部为“密西西比夏季项目”工作，花了相当大精力，帮助密西西比民主自由党挑战民主党。

两年后，当斯托克利发起“黑人权力”运动，把自决原则推广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要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白人支持者自动离开这个组织时，费伊支持这个决定。“我感到很奇怪，”桑尼·德威特——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回忆说，“我同费伊大吵一场，对黑人运动中日益上升的反犹太主义感到不安。费伊表示理解他们的感受，因为他们长期受白人压迫，特别是犹太地主的压迫等。我说，‘我绝不能容忍这些，我不能支持一个反犹太主义的组织，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可理解的。’费伊的火气同样大，坚决反对我。”

位于奥克兰的“黑人黑豹党”是继“黑人权力”后的另外一个黑人组织，它激进但不排斥白人。因为该党一年前脱胎于奥克兰街头的帮会，因此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警察在贫民区的暴力。

他们在街头进行武装巡逻，这在当时是合法的，他们观察警察的拘捕行为，并告诉人们他们应当享有的权利。不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一样把大门对白人关闭，“黑豹党”主张黑人、白人联盟。也不像“种族平等改革大会”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黑豹党”对种族问题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有清晰的革命方案。1967年春天，“黑豹党”还默默无闻，但是发生在那年10月的一件事让他们声名远扬。费伊因为与凯瑞律师事务所有联系，因而也被推到了这起6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审判的中心。

10月27日晚，休伊·牛顿，“黑人黑豹党”的创始人和防务部长，参加完他三年前调查过的一件凶杀案件的庆祝会，在黎明前往回走，被警察约翰·弗雷拦住了。十分钟之后，弗雷死了，中了五枪，其中两枪从12英尺远的地方穿过后背。当另一名警察被叫来增援弗雷时，牛顿受伤了。这个案子有两个证人，一个是增援警察，另一个是恰好在现场的公共汽车司机，都证明牛顿是凶手。“黑豹党”领袖因而被控以谋杀罪。

辩方律师称，弗雷和牛顿两人均被赶来增援的警察击中。但是法庭上的辩论却暗示，即使牛顿开了枪，也是正当的，这反映了当时日渐上升的激进主义观点。作为后来风行一时的激进派教条的先行版本，凯瑞在费伊的帮助下，把美国司法制度本身搬上了审判席。牛顿出庭向陪审团申诉，痛陈种族主义对一个全心信奉基督的年轻人的影响。他讲述自己的过去，由于受不良教育制度之害，他高中毕业时还不识字，后自学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如何把街头罪犯组织起来支持自己的政治运动。他和凯瑞使自己在法庭上成了现代版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几个月内，牛顿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他的海报成为大学宿舍的装饰画，他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穿皮夹克，一手拿矛，一手拿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凯瑞和费伊的辩护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时激进派的观点，成为后来安哥拉·戴维斯、芝加哥七人及其他案件的典范。人们关注的中心从10月发生的那件事情本身转向了整个社会。还在审判开始之前，凯瑞便对大陪审团的种族构成，然后是陪审团本身提出质疑。费伊帮助他完成的发言，成为后来规定陪审团组成的一个案例。最终，法庭、警察被当作种族主义和罪恶制度的代理人，他们试图镇压牛顿，剥夺他的权利，现在又威胁他的生命，仅仅因为他是黑人解放的斗士。这个辩护同当时的激进主义哲学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在激进派社团中，怀疑牛顿有罪被认为是否认美国社会存在种族主义、黑人受歧视的现状。

当牛顿最后被判谋杀罪成立后，国内酝酿着骚动。底特律和其他大城市的黑人贫民区爆发了暴动，学生反叛者还短暂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稍后，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被暗杀，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示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这种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一时间让美国看起来像个警察国家。

左派的心态日趋不安。“气象员”——“学生民主社会”的军事组织——打出了这样的口号：“把战争带回家。”激进派理论家把美国在亚太的帝国主义政策引申到国内社会中，称白人美国是母国，黑人是被殖民的人，他们有权或有责任把自己从被压迫中解放出来，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手段。在一次“学生民主社会”的大会上，“黑豹党”被称为革命先锋，新左派把它当作美国的越共，在美国的城市丛林中为自由而战。

费伊参与了一切有关牛顿案件的法律事务，当判决书下来时，她还在处理这个案子。由于法官文件中的一个技术性错误，两年后牛顿获释。在处理这个案子期间，费伊告诉凯瑞，她想离开这个律师事务所，自己做法庭律师。“我告诉她，她有法律天

才，”凯瑞回忆道，“但她不适合做法庭律师，由于感情问题，她不能很好地处理与陪审团的关系，她同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太深。”尽管如此，费伊还是离开了凯瑞，进入了伯克利的另外一家事务所，这家律师所随后即进行重组，成为西海岸第一家“法律集体”，所内没有级别区分，按需而不是按劳分配。这个所处理一些因示威、反抗、吸毒而产生的法庭审判。

受日益高涨的激进思潮影响，费伊继续为牛顿的案子工作，她定期去探望他。这些探望似乎给了费伊一个借口，使她坚持自己的生活准则。她好像成了牛顿的朋友，甚至爱上他了。探视中，他们深情地看着对方，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还接触对方。牛顿告诉她另外一个黑人青年的故事，此人是加利福尼亚监狱中的一个传奇人物，不仅“黑豹党”，而且从更大的范围来说，费伊也将和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乔治·杰克逊虽然只有 28 岁，但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十个春秋，其中八年是隔离囚禁，一年半时间他的牢门被焊死。他每天要做 1000 次俯卧撑，以保持锻炼，这使得他前臂如此之大，以致于伸不到牢房的栅栏之外。他是空手道能手，自学阅读和写诗，像个诗人，能凭记忆引用毛泽东和弗朗茨·费南的作品。他性格分裂，告诉朋友“马克思主义是我的妓女”，但同时又写作论述严肃的辩证法。

如果费伊对杰克逊的第一印象来自书本的话，那么这个印象可能与阿姆斯顿在回忆录中的描述相似：

> 他年轻清秀，脸形没什么特别的，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我非常高兴见到你，我们有许多事要谈，我有不少问题要请教你”，一切有关他的事情都罩满了光环，他的身体像猫一样起伏不定。当他前倾握我的手时，我

感到自己被吸到了他巨大的能量中了。我根本无法看别的地方，他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这种笑只能存起来给你最爱的人。当我们握着对方的手时，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了。

去见杰克逊，这成了费伊挡不住的诱惑。从一开始，她就觉得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是强有力的，甚至超过了她和牛顿之间的关系。在他们初次见面后不久，杰克逊写信给她：“你是我非常喜爱的人。”她告诉朋友，杰克逊坐牢是一个“可怕的不公正”：7岁入狱，仅仅是因为偷了70美元就坐牢十年。她开始经常出入杰克逊所在的监狱，穿着长靴、迷你皮裙，这身装束当时在左派中很流行。

但是，她造访监狱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工作。1970年1月13日，在监狱院内的一次种族冲突中，三名黑人囚犯被哨兵枪杀。纳伦是他们中的一员，与杰克逊关系很好，曾与他一起工作，促进索勒戴德监狱中囚犯的激进化。三天后，作为对这次枪杀事件的报复，一名看守被打，并被从狱塔上扔下摔死。三名黑人被控谋杀罪，其中就有杰克逊。

费伊认为，负责这个案件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个机会。她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还把本杰明·斯巴克等其他人列为辩护委员会成员。她从伯克利等地募集支持者，开展捐款，最终募集到数万美元。她在旧金山租了房子，让那些卷入这个案子的人居住，但人实在太多了。

这次，她采取的战略完全与上次她和凯瑞为牛顿的辩护相同，制度将被作为最终的罪犯。“三个年轻黑人，索勒戴德的囚犯将被加利福尼亚州谋杀。”费伊在辩护书中写道。他们的罪行是使用暴力，但是长期以来他们受到排斥，因为他们是政治活跃

分子，同时也是黑人。在辩护书中，费伊收集了这三个黑人的照片，他们的手脚戴着镣铐，给人一副被铐起来等待拍卖的奴隶的印象，也有点像南方庄园主拷打奴隶的样子。照片上的杰克逊双眼紧闭，戴着牛角边眼镜，整个清纯男孩的形象，显得很痛苦。

费伊的目的是大力宣传杰克逊，在他进入法庭之前就给大家造成他无罪的印象。在几个月内，《索勒戴德兄弟：乔治·杰克逊的狱中书信》面世，这也是费伊一手策划的。她选编了杰克逊写给她和其他人的一些信，请法国剧作家吉恩·吉尔特作序，自然而然地给此书带来了学术支点。她意在塑造杰克逊是政治犯的形象——他是黑人丹尼尔，从可怕的狮笼里发出正义审判的预言。世界各地的政治活动家、支持者和记者都关注着这个案子。

杰克逊告诉一个朋友，他对费伊定格式的印象形成于这一时期，她与别人谈着这个案子，挥动手臂，像一个指挥家。

费伊发动州议员到索勒戴德监狱参观，促使国会黑人小组调查监狱的状况。利用这些调查及社会工作者的实地取证，她获准可以改变审判地点，把杰克逊转到另外一个城市。

费伊受到了牛顿和杰克逊的表扬，杰克逊称她为“娇小、能干的发言人”。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州的监狱里，她声名鹊起。从监狱里来的邮件开始飞向她的办公室，开始时是几封，随后如同雪崩一般。利用集合在索勒戴德兄弟辩护委员会周围的力量，她建立了“监狱法计划”寻求帮助，并着手解决她认为更大的问题，即刑事公正制度。她开始到大学校园及其他公共场所演讲，抨击索勒戴德监狱的条件，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应当为此做点事”。

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一样，她无情地推动自己和别人不停地运转，不分昼夜地工作，有的时候竟拉着 10 岁的女儿去参加集会、

参观监狱。那是一段非常紧迫的时期，激进运动的部分组织认为采取革命的暴力是对付这个警察国家的必要手段。汤姆·海登等白人激进主义者认为，应当采取建立解放区的战略。“黑豹党”在几个城市陷入与警察的血战之中，一次游击战争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保释中秘密逃往阿尔及利亚。激进主义者把警察的行为称为“种族灭绝”，当有谣传说警方要袭击“黑豹党”司令部时，他们都聚集到司令部外面。费伊总是先行一步，她当时正睡在“黑豹党”戒备森严的堡垒里，身边是自动化武器和沙袋。

“我自己正在变成一个专业反对人士，”她在 1970 年夏季的一次学生研讨会上说，“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一种政治囚犯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有时我想知道我的工作效率是增强了还是降低了。我已经不再喜欢汽车和衣服，我不喜欢休假。我已经不在那个世界中生活了。我确实喜欢在监狱里工作，从最自私的角度来看，当我同一个囚犯谈话时感到很快乐。我非常乐意干这个，这样我才更像个人。在法庭上，当我受到礼遇时，当我体会到作为律师的特权时，感到的是更多的爱。我已经不再使用‘我的被代理人’这个称谓，这个表述已经不属于我的词汇了，当然也从我的思维中消失了，我感到他们是同志。”

这种思维表明费伊在思想上向前跨了一大步，走到了一个在理论上尚未被发现的地方，她的一些朋友认为，或许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可能被发现。约翰·欧文，曾在索勒戴德狱中服刑，出狱后获得社会学学位，成为“囚犯联盟”的负责人。那时，他应邀加入了这个案子。费伊让他听一盘磁带，上面录着一些反对杰克逊的囚徒证言，看看他能否想个办法驳倒这些证词。当他在索勒戴德兄弟辩护委员会办公室时，欧文惊异地发现，费伊及其同

轻而易举地接受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愚昧无知的观点——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罪犯完全是社会环境的牺牲品，监狱只是法西斯国家的早期预警系统，而所有美国的机构都在向法西斯化发展。“我不认为费伊真正了解她所接触的罪犯应当为犯罪负什么样的责任。费伊真的相信，罪犯是社会革命的先锋。”欧文被这种对暴力的浪漫想法所困扰，同样他也发现了他们对性的浪漫想法：“该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是女性，她们在索勒戴德兄弟中都有自己的意中人，且极为崇拜对方，就像青少年对电影明星一样。我简直难以置信。”

伊夫·佩尔，曾在旧金山艺术博物馆工作，后被费伊征召到“监狱法计划”中，就是欧文回忆中的一个妇女。她同意欧文得出的结论，但解释说，罪犯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和不安全感，因此有必要让他们本人及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浪漫化，“我到狱中去看乔治，应当说他处在弱者的位置，我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妇女，而他却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另一端。当我去看他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去监狱。我想，这个男人将不会喜欢我。这个男人将会说：‘回到你无聊的生活中去吧，别来烦我们这些革命者。’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们进行了令人愉快的交谈。到监狱中探望罪犯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在那里你处在一种可怕的环境中，周围是哨兵和军人，他们不想让你到那儿，想方设法让你离开。你同一些小伙子谈话，他们非常专注于你的谈话，我想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他在半年之中仅有一个小时可以同外界联系，他这样做了。我想那是为什么我所认识的该计划的大部分妇女和一些罪犯恋爱了的部分原因。”

费伊也不能抗拒这种情感的诱惑。通过囚犯设计的桃色陷阱，费伊与尚在狱中的牛顿有了性交往，监狱当局曾不得不把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